

近代上海小说地图及其空间隐喻¹

纪兰香

【摘要】：近代小说家对上海城市地理空间清晰而精确的描写，客观上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独特的上海小说地图：以四马路为核心的英租界处于中心区域，法租界和美租界处于次中心区域，边界则在显性空间和隐性空间之间。近代上海小说地图，不仅勾勒出上海城市空间的分布形态，同时还具有家国焦虑、都市困惑以及乡土情结等多重空间隐喻意义。

【关键词】：近代小说，上海，小说地图，空间隐喻

作者：纪兰香，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嘉兴 314000）

小说叙事总是依托在一定的空间中，空间是小说叙事得以发生与展开的基础。但小说中的空间并不是随意的拼凑，而是作家按照一定的叙事逻辑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并且客观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空间形态与意义，读者据此可以绘制出各种文学地图。美国学者弗朗科·莫雷蒂的学术著作《欧洲小说地图集》根据 19 世纪欧洲小说，重点以英国和法国两国著名小说家如奥斯汀、狄更斯、左拉、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绘制了 91 张与小说空间相关的文学图形，从而为文学地图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富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清末时期，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以上海为都市背景的城市小说遽然增加。据本人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百种以上，其中一些小说书名直接点出上海，如《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海上风流梦》《海天鸿雪记》《上海游骖记》等，一些小说虽然题目中没有出现上海，但仍然是以上海为城市背景，书写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如《市声》《九尾龟》《九尾狐》《歇浦潮》等。纵观这时期以上海为城市背景的小说很容易发现：小说中上海城市空间描绘真实且精确，不仅地名、街名及建筑物等真实可信，甚至人物活动的交通线路和活动空间也都真实可考。小说对于上海城市空间清晰而精确的描绘，客观上为外来者提供一种“沪游指南”效应，读者也因此可以根据小说中主要人物在上海城市的行走范围和行走空间绘制出上海小说地图。

一、上海小说地图中心：以四马路为核心的英租界

自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上海城市地图不断发生变化。从市政格局来看，开埠前，上海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上海县城；到了 19 世纪末期，随着英、法、美租界的建立，清末上海形成了“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即一个城市，三个管理机构——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其中，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而成，但在近代市民眼中，英、美租界仍然有着各自不同区域和界限，因此，近代上海城市地图一般标示为四个不同区域：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上海城厢。^[1]这种治理格局不仅体现在地域空间的划分上，还鲜明地体现在以上海为城市背景的上​​海小说地图上。

近代以上海为城市背景小说人物行走、活动空间主要在英租界，其中四马路又是英租界的核心地带。从小说中人物游走范围来看，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外地，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基本相似，即都是以四马路为核心然后向外延伸：住在四马路附近一带的客栈，在四马路上的酒馆、菜馆、茶馆、戏园、妓院等场所娱乐消费，游逛则到静安寺张园、愚园等。《九尾龟》中富家子弟邱八与妓女林黛玉的游走线路颇具代表性：“（邱八）天天同着黛玉坐了马车到张园去兜个圈子。上灯之后，便同到一品香去吃顿番菜，有时吃过大菜再到丹桂茶园去看看夜戏，以为常事。”^[2]邱八的马车出游线路也代表当时大部分游冶子弟

¹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地图研究”（16YJC751007）阶段性成果。

在沪上的游走线路。对于初来上海的外地人而言，要感受上海洋场的繁华氛围，离不开看戏、吃大菜、坐马车、逛张园。《负曝闲谈》第十七回中黄子文的母亲从绍兴乡下到大上海，一个妓女建议黄子文：“请俚看看戏，吃吃大菜，坐坐马车，白相白相张园。”^[3]而对于在沪男性而言，除了以上四项，还要加一项：逛妓院。《官场维新记》中第六回写道：“不要吝惜小费，只管天天的大菜、马车、戏园、妓馆……”^[4]而无论是番菜馆、戏园、茶馆还是妓院都以英租界四马路的最为出名。因此，四马路一带的茶馆、烟馆、戏馆、妓院以及静安寺路的张园、愚园等成为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空间。四马路也因此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如《海上花列传》中出现了44次，《九尾龟》中出现了26次，《海上繁花梦》前三十回就出现了20次。正如李欧梵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如此审视当时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中都有上海。而上海的所谓时空性就是四马路，书院加妓院。”^[5]

以四马路为核心的英租界成为上海小说地图的中心区域，主要因为四马路作为上海最繁华、知名度最大的核心地带，为作者提供了五花八门且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池应激在《沪游梦影》中写道：“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6]清末外国记者眼中的四马路：“福州路（四马路）是上海娱乐场所汇聚之地，那里能找到中国人渴望得到的所有东西——鸦片、音乐、戏剧、女人。福州路是全中国有名的……有些中国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就为见识一下住在福州路上的交际花。”^[7]四马路上几乎集中了上海所有高级的妓院、酒楼、番菜馆、茶室、烟馆等消费场所，尤其是妓院“名扬天下”，《沪游梦影》中写道：“沪上妓院亦甲于天下，别户分门，不胜枚举。大抵书寓、长三为上，么二次之。”^[8]近代上海妓院的社交功能远远大于其色情服务功能。翻开近代小说可以发现，四马路一带的新清和、迎春坊、兆贵里、公阳里、东西荟芳里、兆荣里、兆贵里等处的妓院是小说频繁出现的重要场景。总之，四马路的各类生活空间为近代小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和叙事场景。

繁华热闹的四马路之所以能成为小说中的主要叙事空间，还在于它提供了复杂多元且异质特征明显的人群。1890年《申报》曾经这样描述上海的特征：“蕞尔一弹丸地，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9]四马路作为上海的“销金窟”，汇集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冶子弟和其他人群，这些多元异质人群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

此外，四马路成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也与这时期小说家的上海城市体验有关，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对新鲜感越强、差异性越大的事物总是感受越强烈，而体验越强烈的事物，其感知记忆也就越深刻，也就越容易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四马路为核心的英租界带给小说家的体验和感知无疑是强烈的，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上海小说地图的中心区域。

二、上海小说地图次中心 I：洋泾浜南的法租界

法租界继英租界之后于1849年开辟，最早的范围是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法租界因为较英美租界更接近上海县城，因此大量华人涌入，法租界开始兴盛起来。1883年出版的《淞南梦影录》中记载：“沪上法租界在洋泾浜南，英租界在洋泾浜北，人烟稠密，街市喧闹……”^[10]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二三十年，尽管法租界人烟稠密，但整体而言，其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方面远远落后于英租界。1887年出版的《沪游杂记》中描述法租界：“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透东为闽、广帮聚市处。”^[11]1888年，德国的恩司诺（Exner）来上海考察时写道：“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欧洲人的‘行’（商人的办公室）都设在英租界，而货栈和船坞以及众多的中国房屋却都在法租界。”^[12]1898年，来自德国的记者高德满（Goldmann）眼中所看到的法租界：“如果要对英国人在上海所作的贡献进行全面估价的话，只需要看看法租界，看看法国人没做什么……在那些以著名的法国名字命名的街道上，中国人造起了他们的低矮肮脏的木屋……这里法国居民很多，大多数都住在英租界。”^[13]在高德满看来，尽管法租界有雄心，但并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在城市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英租界。

在近代小说中，在沪的游冶子弟和体面人群除了偶尔到法大马路的酒楼消费外，很少光顾法租界。法租界主要成为社会底层以及生活窘迫人群的聚居地，也因此成为近代上海小说地图的次中心区域。相比于繁华富丽的中心区域英租界，法租界的城

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远远落后，生活成本也相对廉价。与四马路上主要满足经济宽裕或社会中上层人群需求的高档旅馆相对应，法租界建有大量的低廉简陋的旅馆、出租房，因此，法租界往往成为外来穷困或社会底层人群的首选之地。《海上繁华梦》中的夏时行是一个外来贫家子弟，为了装体面，尽管白天也经常出入四马路的长三书寓，与一群纨绔子弟叫局吃花酒，但因为在上海没有找到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只能在法租界八仙桥附近一条小弄里头，与三户人家合租一幢低小房间。因为长期欠下了长三堂子的局账，妓院的姨娘找上门来，看到他穿着破烂，租住在一间简陋、狭窄不堪的小房间时，双方都极为尴尬，当然他更还不起嫖债，从而引发了一场争执。与四马路的高等妓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租界聚集了大量的下等妓院。海上漱石生在《沪燻话旧录》中写道：“花烟馆为下流社会寻欢之地，向聚于法租界小东门外及老北门外之新街各处。……今法租界依然如昔也。”^[14]在《海上花列传》中，富家子弟驻足于四马路一带的长三堂子，而法租界新街的下等妓院成为外乡贫家子弟赵朴斋、张小村以及一些富贵人家仆人们等寻花问柳的去处。与四马路长三书寓相比，这里的房屋狭窄，室内装饰非常简陋，不用说，花烟间妓女无论在才貌、应酬功夫等方面和英租界四马路的长三、么二妓女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此地与赵朴斋这类无业和身份地位较低的浪子较为匹配。

法租界也往往成为纨绔子弟在沪落魄后的容身之地。近代以上海为城市背景的小说主要人物大多来自上海周边县城殷实家庭，他们初到上海，毫不犹豫选择住在四马路一带的高级客栈，活跃在四马路的各个消费场所，一旦挥霍光身边所有的钱财，他们会被英租界毫不留情地驱逐出来，而法租界往往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接纳他们。《海上繁华梦》中的一对纨绔子弟游冶之、郑志和初到上海手头阔绰，住在四马路附近房屋高爽、饭食精洁的长发客栈，与一班浮浪子弟出人于四马路的各消费场所。迷恋上妓女后，他们在四马路西首的观盛里租赁了高阔洋房居住。不久，妓女卷走其所有钱财，他们变得一贫如洗，起初还住在英租界一家房屋简陋、饮食粗糙的小客栈。后来贫病交夹，身无分文，被小客栈赶了出来，只得住进了法租界郑家木桥附近廉价、简陋、破旧的叫化客栈，直至最后返乡。

总之，在近代小说中，法租界因为在城市建设、商业贸易等方面相对落后，生活费用相对低廉，主要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社会底层以及生活窘迫人群。五方杂处且治安不靖，法租界早期治安很混乱，尤其是英法租界河界的郑家木桥和东新桥一带，下等烟馆、赌场、妓院集中，帮会流氓活动猖獗，往往是滋生各类犯罪的温床。因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很少光顾这一带，这一带主要成为小说中各类落魄潦倒之人以及社会底层的据点，也因此成为小说地图的次中心区域。

三、上海小说地图次中心 II：虹口一带的美租界

美租界处吴淞江北，主要在虹口一带，“美界自二摆渡河北至虹口皆是”^[15]，《淞南梦影录》中记载：“美界在吴淞江北，俱系粤商及日本人住宅。其气象非特远逊英界，即较之法界，亦难免相形见绌焉。”^[16]稍后出版的《沪游杂记》中写道：“美（租界）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17]可见，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租界的城市发展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租界，也逊色于法租界。这一带是上海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集聚了大量的搬运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此外，虹口一带在城市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生活其间的生活成本也相对低廉，因此这一带不仅集聚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经济窘迫的人。1898 年，德国记者高德满（Goldmann）写道：“关于美租界，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里名叫虹口，沿着船厂延伸出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上海的港口区……主要街道当然是叫‘Broadway’，也确实挺宽的，但是房子大多破旧且难看。人们去那儿，主要为的是那里有中国小店里的木刻工艺品。”^[18]在高德满（Goldmann）看来，美租界破旧落后，和英租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在近代小说中，虹口一带的美租界与洋泾浜南的法租界一样成为上海小说地图次中心区域。虹口一带的美租界之所以成为次中心区域，主要是因为这一带无论是在城市建设方面还是在商业繁华以及物欲享乐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租界，因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多驻足于四马路一带，而很少光顾虹口一带。虹口一带主要成为经济能力较差、生活窘困或身份特殊等人群的生存空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主要写了住在虹口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落魄官宦子弟黎景翼，因父亲不善理财，亏空欠债数量巨大，因此全家从福建逃出来，最后搬到上海虹口地区，但因为多年赋闲，穷困潦倒之际，他想图谋弟弟的钱财，于是亲自逼死自己弟弟，希望落空后，又图谋把弟媳卖到妓院以获得一笔钱财，总之这个落魄子弟为了钱财丧尽天良；另一个是以路边测

字为生的寒士，因为近几年失了馆地，窘迫不堪，因看见同乡大多在虹口一带设蒙馆，因此也到虹口路边测字，穷得一家人只住在一间破屋里。可见虹口一带成为生活比较艰难困窘之士以及不甚得志之外来者的生存空间。

虹口的相对偏僻，也往往成为一些身份特殊的“边缘”人群，诸如革命党、身份暧昧者、犯罪份子等人的首选之地。《孽海花》中的革命党、秘密情人、逃妾都选择住在虹口。虹口一带也往往成为被四马路排挤出来落魄之人安身之所，尤其是外来纨绔子弟困顿潦倒后的容身之所。《恨海》中的官宦子弟陈伯和因庚子之变从北京逃往上海。从陈伯和在沪的迁徙轨迹来看，富裕时住在四马路一带，落魄潦倒后住在虹口一带，他从发迹到堕落的过程，也是他从四马路被驱赶到虹口一带的过程。

美租界和法租界作为近代上海小说地图的次中心区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两个租界在城市建设、商业发展、繁华程度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英租界，因此成为小说中次要人物的生活空间，或主要人物落魄后短期的栖身之所。而这时期小说家大多怀着“劝惩”的创作目的，把目光聚焦于租界中让人“陷溺”的繁华地带以及活跃在这个中心地带的人群，以期警醒劝诫游冶子弟，正如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开篇写道：“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19]这个让人“陷溺”的繁华地带和中心地带主要在英租界，法、美租界自然成为小说地图的次中心区域。

四、上海小说地图边界：显性与隐性空间之间

地理空间上的“边界”指的是相邻区域的连接地带。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向》一书中提到城市的“边界……通常是两个地区的边界，相互起侧面的参考作用。”^[20]在近代上海书写的小说中，人物活动范围主要在租界，租界成为近代上海小说地图的主要空间和显性空间。读者对于租界里的吃、住、行、玩、乐等日常生活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但对于与之一墙相隔的上海县城的情况几乎无从知道。上海县城作为上海地理空间的一部分，与其周边县城一起成为连接近代小说中上海与其相邻区域的地带，是小说人物进出租界的通道、出发地和归宿地。

上海县城虽与租界毗邻，却很少有外来子弟在此驻足，即使是本邑子弟，也都奔向繁华热闹的租界洋场。《海上繁华梦》中从苏州来上海游玩的谢幼安、杜少牧，在选择住在北市（指租界）还是南市（指上海县城）问题上，小说写道：“幼安一想，少牧是个爱热闹的，就是借在南市，一定也要天天往北，倒不如北市便些。”^[21]他们的选择也是当时多数游沪外地人的选择。而上海本邑子弟同样很少留恋拥挤破旧的上海县城，《海上花列传》小说中的陶云甫、陶玉甫兄弟虽是上海本城宦家子弟，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主要在租界，小说对于他们在县城的生活情况毫无交代。小说中的商人洪善卿虽在上海县城咸瓜街开了永昌参店，但小说基本没有交代其在南市的活动，他的日常生活主要在四马路一带的英租界。因此在近代上海小说地图中，上海县城处于边界地带。

近代小说中活跃在上海租界的人群主要来源于上海周边县城，包括江浙地区的松江、苏州、杭州、常州、湖州、无锡、宁波、扬州等地。这些地区不仅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来源地，而且也是小说人物离开租界后的归属地。《九尾龟》中主要人物章秋谷、方幼恽、刘厚卿、贡春树、方子衡都来自江苏常州，邱八来自湖州。《海上繁华梦》中的主要人物谢幼安、杜少杜、钱守愚、钱少愚等来自于苏州，潘少安则来自于常州，而游冶之、郑志和则来自于扬州。上海之所以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们，正在于上海的繁华、时尚、奢靡。上海周边县城成为小说人物进出租界的地带，也因此成为上海小说地图的边界。

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县城作为近代上海小说地图的边界，它既是小说地图中上海与其相邻区域在地理空间上的连接地带，也是小说地图显性空间和地图以外隐性空间的边界。如果说显性空间是租界、现代、城市空间，那么隐性空间就是本土、传统、乡土空间。上海县城作为中国传统县城的缩影，与租界天壤之别。当时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评论道：“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22]当时的外国记者有同感：“在外滩延伸出去几百米远的马路上，才开始了中国人的城区……只有真正的、城墙围着的中国城和法租界的一部分地方，还能见到狭窄而齷齪的小巷子。这是所有中国城市都有的景象。”^[23]《文

明小史》江南吴江县乡下青年贾家三兄弟在报纸上了解到上海诸多新鲜事情和外洋新奇器物，感叹道：“可叹我们生在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观天，百事不晓，几时才能够到上海去逛一趟，见见世面，才不负此一生呢？”^[24]总之，上海租界的宽敞、整洁、繁华、时尚、开放等都市景观与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县城所构成的拥挤、肮脏、简陋、落伍、闭塞的传统县城景观相比，正是租界与本土、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土在基础设施和物质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时，租界的各种光怪陆离、险象丛生的社会现象与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县城习以为常、传统保守的社会习俗正是租界与本土、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正因为如此，近代小说中大多数外来青年在上海洋场经历了一番绮丽险恶的游历之后，最后纷纷返乡，回归到传统的乡土空间。

五、上海小说地图的空间隐喻意义

小说中的叙事空间是小说展开叙事的空间载体，并且特定的空间产生特定的情节、故事，特定的情节、故事需要特定的空间。小说的情节、故事与叙事空间可谓互相生成。弗朗科·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总结欧洲小说地图的特征：“文学形式有其空间——界限：每种文学形式都有自己独有的几何形状，它有边界、空间禁忌以及最喜欢的路线。”^[25]近代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城市小说也有其边界、空间禁忌和喜欢的路线，体现在小说地图上，形成了以英租界为中心，法、美租界为次中心，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县城为边界的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分布形态具有多重隐喻意义。

首先，上海小说地图隐喻着小说家的家国焦虑。近代上海小说地图可谓是租界的地图，而租界的设立和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开埠城市直接相关，而且是以民族丧权辱国为前提和代价的。从最早占地面积不大的一块英租界到英、美、法租界面积最终占据上海城市的大部分面积，这正是西方列强以其政治势力、金融资本、身份优势等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对上海城市空间进行重塑的结果。上海正是在列强国的资本生产下走向城市化、全球化。不仅如此，列强国还利用清政府的无能，逐步夺取了租界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使得租界客观上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缝隙地带”，成为清政府统治失控的地带。这种状态使得上海租界很容易摆脱传统道德秩序的束缚，从而成为道德观念松弛的地带。

另外，租界的本质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赚钱是外国人千里迢迢来上海的唯一追求。一位英国人赤裸裸地谈到自己来华目的：“我的职责是尽可能不失时机地赚钱发财，我把地皮租给中国人，或者造房子租给中国人，从中取得三到四分的利息，那是因为这是我能拿钱来做的最有利的交易。我希望至多两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就滚蛋，以后上海是被火烧掉还是被水淹没，跟我有什么关系？请您不要指望，像我这样的人会为了后代的利益而让自己成年累月地流放在这个不卫生的地方。我们都是‘赚钱的人’，是讲究实惠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赚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凡是法律许可的一切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租界奉行的重利轻义、重物质享受轻伦理道德的商业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国的伦理观念背道而驰，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被彻底颠覆。正如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这样写道：“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通逃藪。”^[27]在此，吴趼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租界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焦虑。当小说家把所有目光聚焦在租界这个显性空间上，并表现出对上海租界社会风气、道德体系、价值观念的焦虑，正是其家国焦虑的体现。

其次，上海小说地图也隐喻着小说家的都市困惑。“根据记忆心理学研究，人对环境的印象和记忆分为物、场、事三个层次。”^[28]作家对城市的印象和记忆也离不开物、场、事三个层次。物，指的是具体的物体。场，则指的是具体的场所。事，则是发生在具体场所中的事件。其中，场是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也是物和事的空间载体。从“物”的角度来看，近代小说家大多以一种近乎“沪游指南”的创作笔法详细地介绍英租界种种时尚新奇器物，从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到日常生活中的日用器物。如一品香番菜馆的装饰，不仅房屋装饰华美、器皿精致，而且及时引进了国际上最新科技成果，有电灯、电风扇、电话等，其物质水平几乎都与世界同步。从“场”的角度讲，近代上海小说地图的中心区域在以四马路为核心的英租界，即英租界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空间场所，小说家安排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终日徜徉于英租界四马路上各种繁华热闹场所和各个大型公园，其中在上海小说地图中被明显标识出的场所有：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丹桂戏院、荟芳里的长三书寓以及静安寺的张园等。如张园集游览、饭馆、茶楼、戏院、书场、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等为一体，成为娱乐、休闲设施最时髦最齐全的场所。小说家让其主人公频繁出入且流连忘返这些繁华时髦的场所，并详尽细致地介绍租界各种新奇器物，从中可看出小说家对租界物质文明

的钟情和迷恋。从“事”的角度而言，繁华奢靡的英租界虽然是温柔富贵之乡，但却充斥着大量的诱惑、欺骗等陷阱。很多外来子弟来沪后或沉溺各种欲望中而无法自拔，或因涉世不深而上当受骗，最后钱财丧尽甚至丧命。近代小说家以一种狂欢化的创作手法不厌其烦地叙述外来青年在英租界的种种迷失、堕落甚至毁灭故事，以及英租界种种坑蒙拐骗的事件，从中反映出近代小说家对租界中城市社会风气的恐慌和担忧。因此，近代上海小说地图隐喻了小说家对上海租界既迷恋又恐慌的都市困惑。

再次，上海小说地图也隐喻着小说家的乡土情结。近代上海小说地图中人物大多来自上海周边县城，他们厌倦家乡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沉闷、思想的落伍，慕名上海洋场的繁华时尚、文明进步、风流富贵，于是从各地聚集于租界，这些“勇敢”闯入租界者其实也是空间的“越界者”，即从传统乡土空间闯入现代城市空间，但在经历了一番绮丽险恶的都市体验之后，他们最终大多幡然醒悟，选择回归到传统乡土空间。《文明小史》中贾家三兄弟从报纸上了解到上海的繁华、文明，心生神往，欣然游沪，但在上海目睹了一幕幕的虚伪、丑陋的社会现状后，返乡归里。《九尾龟》中常州乡宦子弟方幼恽，出身纨绔，经常听亲友夸说上海如何热闹，马路如何平坦，信人如何标致，便携资来沪，但在上海遭遇了被妓女诈骗勒索之后，便立即醒悟，选择返乡。沪上之游似乎只是为了见证城市繁华奢靡与险恶伪诈并存，返乡成为他们游历之后的最终选择。在小说家看来，城市是充满重重诱惑和陷阱的富贵浮华之地。城市使青年沦陷堕落、弃家荡产甚至丧命亡身，而传统的乡土空间才是他们成长和成才的沃土。《海上繁华梦》中游冶之、郑志和在上海荡尽钱财，险些丧命，返乡后洗心革面，浪子回头，发愤读书，有心向上，返乡后两人的行为举止也大非昔比，由在沪时的语言轻浮、举止浮躁变得语言诚实、举止大方，彬彬尔雅。小说种种返乡安排反映出近代小说家对传统乡土虽有批判但更多是认同的乡土情结。

对比 19 世纪巴尔扎克巴黎系列城市小说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从中可以更鲜明看出中国近代上海系列城市小说作家的乡土情结。巴尔扎克小说中很多角色都是从外省进入到巴黎，如《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吕西安等，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艰苦节俭的外省生活方式转变为浮华奢靡的巴黎都市生活方式，但与中国外乡青年进入上海但最终返乡不同，他们来到巴黎后，迫切地希望融入巴黎都市生活中来，“而且这些角色一旦打进这个圈子，他们绝不回头，即便他们最终在巴黎失败而招致毁灭（如皮罗托与吕西安）。”^[29]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外省生活方式在以巴黎为代表的都市生活方式面前极为不自信，甚至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姿态出现。而中国近代以上海为背景的城市小说则恰恰相反，小说中人物对传统乡土生活方式极为依恋，城市生活方式不过是他们传统乡土生活方式的调味品，他们的最后归宿在故土。如果说巴尔扎克小说在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中，城市已经取得了主导性地位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小说在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中，城市的力量仍很薄弱，传统乡土空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中也反映出近代小说家在遭遇了现代都市生活体验之后，对传统乡土生活方式认同和依恋的乡土情结。

总之，近代上海小说地图不仅勾勒出近代小说中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反映出其内在叙事逻辑，也是解读近代上海城市的文化密码，从中折射出特定时代小说家的独特情感诉求和复杂城市感知。

注 释：

[1]上海点石斋光绪十年（1884 年）出版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按不同颜色标明英、法、美租界以及上海县城城厢的区域范围。黄式权在光绪九年（1883 年）年编著的《淞南梦影录》中记载了当时英、法、美三个租界的大致地理位置：“沪上法租界在洋泾浜南，英租界在洋泾浜北……美界在吴淞江北。”池应激大约作于 1893 年的《沪游梦影》写道：“凡英、法、美三国所居之地，皆谓之‘租界’。”1898 年，一位来华采访的德国记者高德满（Goldmann）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上海是由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组成的……但是一般来说，英租界才是真正的城市……”

[2]漱六山房：《九尾龟》，荆楚书社 1989 年版，第 175 页。

[3]蘧园：《负曝闲谈》，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 页。

-
- [4]佚名：《官场维新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 页。
- [5]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8 页。
- [6][8][10][11][15][16][17]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6、163、103、1、155、103~104、1 页。
- [9]《申报》1890 年 12 月 1 日。
- [7][12][13][18][23]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4、115、170~171、172、153 页。
- [14]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 2》，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3 页。
- [19][21]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 页。
- [20]凯文·林奇 (Kevin Lynch)：《城市意向》，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 页。
- [22]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
- [24]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2 页。
- [25]Franco Moretti: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London: Verso, 1998, P5.
- [26][英]阿礼国：《大君之都》第 1 卷，第 37~38 页，载[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6~147 页。
- [27]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 [28]陈望衡、丁利荣主编：《环境美学前沿》第 2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7 页。
- [29][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6 页。